

# 序章

## 第一節 芥川龍之介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上海接觸

1921年4月，日本著名的文學家芥川龍之介訪問了上海。他當時到過的地方，經過其後100年的滄桑，很多已經舊蹤難覓，現在只有一處復原成當時的樣子加以保存。這處建築，現在的門牌號是盧灣區興業路76號，舊時是法租界望志路 (Rue Wantz) 106號。<sup>1</sup>不過，對這處建築加以復原並非是為了紀念芥川造訪上海的足跡，現在來到這裏的人們都會看到門前的銘牌上刻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的字樣。也就是說，在芥川來到該處不久後，就在他所看到的那個地方，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sup>2</sup>

當然，芥川並非因為知道中國共產黨將要在這裏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而來，而是為了會晤「少年中國」代表人物之一的「李人傑」。李人傑 (1890–1927)，原名李書詩，通常稱李漢俊，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 (以下簡稱「中共») 成立時的成員之一 (脫離中共後，1927年遭軍閥逮捕殺害)。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芥川來訪三個月後，即1921年7月末，就在

李漢俊的寓所召開了。芥川在中國共產黨將要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地方，會晤了中共領導人，實在是一種巧合。

據推測，芥川和李漢俊是4月25日前後晤面的，芥川《上海遊記》裏有〈李人傑氏〉一節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與村田〔《大阪每日新聞》記者村田孜郎〕同訪李人傑氏。李氏年僅二十八歲〔原文如此，李氏正確的生年為1890年〕，按信條應為社會主義者，上海「少年中國」代表人物之一。……有僕人即引予等到會客室。有長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盤，盛陶製果品。……除此粗糙之仿製品外，更無可賞目之裝飾。然室內不見塵埃，樸素之氣令人爽悅。數分鐘後，李人傑氏來。

李氏曾在東京讀過大學，故日語極流暢。就其善於使對方明白費解的道理來講，其日語也許在我之上。……會客室內通向二層的梯子垂落於室內一角，故有人下樓，客人先見其足。李人傑氏出現時，我們最先看到的也是他腳上的中國鞋。<sup>3</sup>



圖一 李漢俊



圖二 芥川龍之介，1921年



圖三 修復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場

「少年中國」一語譯自“Young China”，是中外新聞界對當時富於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慣用的稱謂，並不一定專指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李漢俊是中共領導人之一，但是芥川並非因此才去見他，而李也不會對初次見面的芥川談到成立共產黨的事。

芥川對李漢俊居處的描寫，和現在的「中共一大會址」完全一樣。復原的大會會議室裏，擺着長方桌和洋式坐椅，也有通往二層的樓梯，同樣簡樸得沒有任何令人悅目的飾物。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恐怕就是在這間芥川走後沒有加以任何改變的房子裏召開的。

對李漢俊的印象和談話的情景，芥川這樣記載道：

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髮稍長，長臉，血色不足，目帶才氣。手小。態度頗誠懇，同時又讓人感到神經敏銳。第一印象不壞，恰如觸摸細且強韌的鐘表發條。……李氏道，如何改造現在的中國？要解決此問題，不在共和，亦不在復辟。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國，過去既已證之，現狀亦證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會革命之一途。……李氏又云，要興起社會革命，不能不依靠宣傳。是故吾人要著述。……種子在手，唯萬

里荒蕪，或懼力不可逮。吾人肉軀堪當此勞否？此不得不憂者也。言畢蹙眉。<sup>4</sup>

上海共產主義組織的領導人李漢俊，在此次會晤兩個月之後，受共產國際指示，開始召集各地成員，以召開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此時他正在上海的進步報刊上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學說，其筆鋒犀利、邏輯嚴謹、感覺敏銳，恰如芥川對他相貌的描述一樣。這一點，從初期共產主義者稱他為「我們中的理論家」、「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sup>5</sup>也可得到證實。正是他對芥川說，中國需要社會革命。所謂「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國」，是指辛亥革命後誕生的共和國或「民國」不久即成為一副空架子，造成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也就是說，中國需要整個社會的革命，而不是中央政府權力的私相授受或互相爭奪；自己正是為了宣傳革命而面對「萬里荒蕪」大聲疾呼。同時表達了「懼力不可逮」、「吾人肉軀堪當此勞否」的悲壯決心。

會見快結束時，芥川問：「除宣傳手段外，尚能顧念藝術否？」李漢俊的回答只是：「幾近於無。」據說他也曾讀過被稱作「藝術主義」或「藝術派」的芥川的小說，可芥川沒有記下面對如此回答自己作何感想；不過芥川對李漢俊其人頗有好感。芥川4月30日從上海寄給澤村幸夫（《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信中特別提到他：在上海見到的名士中，「李人傑才華出眾」。<sup>6</sup>當然，這時的芥川不會想到，這位目帶才氣的青年將和自己同一年（1927年）夭折。

## 第二節 促使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

李漢俊對芥川談到決心進行社會革命時表達的壯烈態度，是參與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情。中國的民眾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確實表現出了空前的覺悟和力量，但是，要

使其按照明確的方針（比如社會主義）發展成為社會革命，從而根本改造中國社會，還存在着許多有待克服的障礙，其中之一就是李漢俊向芥川喻之為「萬里荒蕪」的中國社會的現狀，以及缺少滿足中國知識分子求知欲的書籍和雜誌。其次，作為社會革命基礎的工人運動，儘管不斷發生工潮，但其實際性質仍然屬於同鄉意識、同業公會的範疇。另外，中國究竟有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這也是籌備成立共產黨的李漢俊等人思索的問題之一。

儘管如此，困難和曲折最後都被克服，在20世紀20年代伊始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個黨在歷盡曲折之後，在1949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現今已經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這些也都是眾所周知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誕生的？這是本書要解答的問題。

以中國為主，世界上對中共成立史的研究數量非常多，以成立史為對象的專著在2001年以前已有20多部，研究性文章則達2,500多篇以上，再加上最近20年的著作更是不可勝數。<sup>7</sup>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來越細緻，具體人物的行蹤和幾乎所有事件的時間、地點都得到了考證。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勞動效率觀之，對中共成立史這一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尋常的。

既然已經有了如此眾多的研究成果，為什麼還要再寫這部書呢？那是因為這些研究並沒有弄清中共成立過程中的許多問題。或者說，大量的研究反而導致這樣一個傾向，即輕易地相互借鑒，甚至以訛傳訛。比如，中國共產黨草創時期的各種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社會主義者同盟、社會共產黨、革命局，等等）到底是何種組織？何時成立？相互間關係如何？對這些問題目前還僅是根據回憶錄等進行各種猜測。因為每一個事件都應經過研

究考證，在描述中共成立史的時候，更必須加以細致的、有時是瑣碎的甄別。本書的描述總體上傾向於考證，就是基於這種考慮。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見解，中共的成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sup>8</sup> 這個見解，由大處觀之的確如此。因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傳播，另外，據信1919年全國已經有約200萬產業工人（其中上海有約50萬人）。可是，在追覓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具體過程，特別是與日本、朝鮮的共產黨成立相比較時，我們不禁會產生這樣一個單純的疑問，即共產黨在東亞成立，為什麼是循着朝鮮、中國、日本這樣一個順序？日本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1922年，即中共「一大」之後一年召開的。至於高麗共產黨，儘管由於存在分別成立於伊爾庫茨克和上海的兩個派別，情況要稍微複雜一些，但也都成立於1921年5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約兩個月。如果共產黨的成立僅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那麼，共產黨在東亞成立的順序應該是日本、中國、朝鮮，但是，為什麼事實卻恰恰相反呢？

如果說，這種「時差」僅僅是可以忽略的「極微誤差」，共產黨在這三個國家幾乎是同時成立的，那麼，就必須解釋之所以同時成立的原因。這個原因，不用說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其後共產國際在東亞各國進行的推動工作。實際上，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的存在，才是造成共產黨按完全相反的時間順序在日本、中國、朝鮮成立的真正主要的原因。既然共產黨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成立，是以共產國際為紐帶而密切相關的，那麼就不能夠將其分開來看。換言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能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這樣一種狹窄的觀點來考察，而必須從東亞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寬闊視野來把握。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探討中共成立的必要條件即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無論在哪個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都是成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必要條件。而就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是何時從何地傳來的呢？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sup>9</sup>毛澤東的這段話，作為受俄國革命鼓舞而參加共產黨的當事者的感性認識，應該得到尊重；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因為俄國革命成功而一下子就傳進中國的。當時的毛澤東恐怕也知道，中共成立以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大部分是經由日本傳進中國的。上述李漢俊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過閱讀日文社會主義文獻接觸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工作。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經過「社會主義嚴冬時期」之後再次高漲的形勢是分不開的。這些都表明，必須把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置於整個東亞的社會主義思潮範疇之內來把握。進一步講，日本和中國在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結成的鏈條，應該視為東亞各國以日本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歷史的一環，甚至應該將其置於世界規模的思想交流<sup>10</sup>這樣的背景中來理解。在這個意義上講，本書所敘述的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正是貫穿於中國和日本及世界之間的「思想鏈條」的歷史。

共產黨成立之前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的傳入，這在中國也與日本一樣，都是獲得「外來知識」的過程。而馬克思主義在「外來知識」即西方思想中，又尤其晦澀難懂，所以，不難想像即使有日文文獻的幫助，接受起來也有很多困難。與李漢俊一樣，通過日文文獻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被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李大

釗，在1919年介紹馬克思主義時，曾轉述一位德國人的話說：「50歲以下的人說他能了解馬克思的學說，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sup>11</sup>所以，在探討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時，不但應該充分考慮到知識本身固有的難度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而且也應該考慮到，儘管存在這樣的距離，所謂「共產黨」也必須以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為基礎。

但是，成立共產黨必須在何種程度上理解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日本、中國和朝鮮在共產黨成立時，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水平當然各不相同。就中國、朝鮮兩國來講，對馬克思主義理解得不成熟，許多青年與其說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不如說為了從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而加入共產黨，這在高麗共產黨裏面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同樣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於中國共產黨裏面，許多黨員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同時，也追求祖國的「獨立」和「富強」。「我們多數同志幾乎是先當了共產黨員才學習馬列主義。」<sup>12</sup>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原因就在於此。

那麼，引發共產黨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如果說何種程度上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充分條件，無產階級的人數和工人運動的規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國共產黨成立時間的要素，那麼，蘇俄和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就顯得重要起來。

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在第一次大會（1919年）上並沒有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運動，它是在歐洲的革命運動趨向低潮之後才注意到亞洲的，而重點提出「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則是在第二次大會（1920年7月至8月）上。我們在回顧共產國際的歷史時必定要提及的列寧與羅易（M. N. Roy）圍繞「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所展開的爭論，就發生在這次大會上。雖然羅易關於亞洲的革命將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見解並沒有寫進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去，但確實是共產國際認識到亞洲重要



性的主要原因。其次，對於因西伯利亞干涉軍的漸次撤退和遠東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的衰退而逐漸重新掌握遠東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來說，1919年發生在朝鮮的三一運動和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都足以使其把目光投向東方。於是，1920年9月，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在巴庫召開的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上，《共產黨宣言》裏的有名語句被重新闡發，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sup>13</sup>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對遠東的工作，從1920年前後，以派遣使者的形式開始了，與此同時，在俄國國內的中國和朝鮮的僑民也成為了工作對象。高麗共產黨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說，單就成立共產主義組織或遲或早來看，決定因素並不在於有無工人運動，或者是否已經接受了社會主義理論，而在於與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接觸是否便利，這是不可否認的。從這點講，我們不能忘記，與陸路相連的中國接觸，顯然要比與日本接觸容易得多(就日本來講，還要考慮到日本警察的嚴密防範)。

不言而喻，中共成立史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是中共的成立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因為，沒有共產國際就不可能有共產黨，至少，當時的所謂「共產黨」的成立，首先要視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是否作為共產國際在各國的支部)而定。此前雖然也有一些重視共產國際等外部因素的研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向青、楊奎松等先生作出的先驅性研究，<sup>14</sup>但是資料本身十分匱乏，加上這些資料中有關共產國際的文件被長期封存，所以，有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另外，多種語言的資料分散在中國以外，這些資料既互相交錯，又有不少互相矛盾之處，故而要斷定一個個事實殊非易事。前蘇聯的解體以來，所謂莫斯科檔案大都得到解密，從前只被少數蘇聯學者壟斷並部分引用的文件資料，現在大都可以讀到。<sup>15</sup>而且，有關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大型資料集也已經

出版。<sup>16</sup>但其中中共成立時期的文件所佔分量並不多。比如，1921年1月至翌年初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曾經是共產國際對中國工作的最重要機關，但其活動的具體狀況迄今是個謎團。同樣，儘管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共成立時期派到中國的人員中有俄國人、荷蘭人、英國人以及朝鮮人等，但是，此前除了關於魏金斯基(G. Voitinsky)、斯內夫利特(H. Sneevliet，一名馬林[Maring]，本書採用其一般稱呼「馬林」)等有比較完整的研究<sup>17</sup>以外，其他出現在回憶錄中的「密使」們，至今連其生平也不得而知。

另外，1956年至翌年，當時的蘇共中央曾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sup>18</sup>交還給了中國共產黨，該檔案現保存在北京的中央檔案館內，其中包括共產國際與中共的來往文件等約兩萬多件，但其中中共成立時期的文件只公開了幾份。現在，該檔案館不但外國學者不得涉足，連對中國學者也仍然緊閉門戶。<sup>19</sup>在這種狀況下，要弄清初期的中共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關係，當然存在相當大的困難。儘管如此，本書將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料，力圖再現蘇俄和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人員交往。

這裏順便還要提一下如何對待回憶錄的問題。由於初期的共產黨是人數極少的秘密組織，因而第一手資料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回憶錄在資料中所佔的比重自然很大。例如，中國出版的共產黨成立時期的綜合性資料集《「一大」前後》(共三冊)<sup>20</sup>中，回憶錄佔到了一半以上的分量。這些回憶錄中當然難免有記述錯誤或誤解，甚至存在主觀判斷造成的偏頗。因此，回憶錄雖然在了解當時的氛圍方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要通過它們來確定具體的時期或事件，卻大有值得商榷之處。還有些回憶錄是在其他回憶錄的基礎上潤色而成，故此，不少情況下並不能因為其敘事詳細

而加以輕信。關於如何對待中共成立時期的資料，日本學者森時彥早就指出過分依據回憶錄的危險性，他主張對待回憶錄要先進行一番徹底清算，然後再主要依據第一手資料重新建構黨史。<sup>21</sup> 這個主張，對在有關黨史資料已經相對大量公開的現在，仍然具有說服力。本書中，有的部分當然不得不依據回憶錄，但在論述時，將努力根據已公開的第一手資料對每個回憶錄加以引證和糾正。

看看中共成立時期中國國內的狀況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的人才基礎正是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以學生為主的青年知識分子。試想，如果中國自己不願意成立共產主義組織，縱使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得再廣泛，或者蘇俄和共產國際再做工作，也不會產生共產黨。因此，以新文化運動的幹將陳獨秀為中心的激進知識分子們，才是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段歷史的主人公。最初的中共有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濟南、長沙、日本、歐洲等地方組織，但是這些組織的成員們結合為共產主義組織的過程各不相同。有的是作為新聞工作者在介紹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感到有成立黨的必要，有的是從事學生運動的，甚至有的人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初期黨員以後所走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例如，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的13名中國人中，到1949年還在人世的有六人，但能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除了毛澤東、董必武之外的11個人中，在共產黨的革命運動中就義的三人，病逝者一人，而脫黨的有七人，即超過出席「一大」人數的一半。<sup>22</sup> 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為了收集黨史資料，對早期參與黨的工作的人千方百計地進行調查取證，結果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有關創建時期的地方組織的雜誌、回憶錄等資料。在這種背景下，在中國進行了大量

研究，其數量對於一個50餘人的小組織來講極不相稱。在中國，中共創建史研究主要指對這些地方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創建史的研究，和早期領導人的人物研究。

本書有關中共創建時期地方組織的記述，許多地方依據中國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須指出，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觀點整理出的這類組織史，其對象只覆蓋了與後來的中共有繼承關係的組織，因而有遺漏，「異端」或「冒牌」共產黨——如果把與現在的中共有繼承關係的組織稱做「正統」的話——的存在，就是一個例子。在當時，儘管「共產主義」一詞的內涵不是很明確，但卻強烈地吸引着部分知識分子，而「共產黨」的名稱也還不是專指中國共產黨，為此，中國各地存在許多所謂「冒牌」共產黨。這一事實卻幾乎不為人知。此類「冒牌」共產黨之一是以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部分領導人物為中心組織起來的，但不久後因未能贏得正統地位而煙消雲散。但是，曾經有一個時期，蘇俄、日本及朝鮮都有些進步分子將他們當作中國的「共產黨」。「冒牌」共產黨湧現的背景之一是，蘇俄方面對中國的工作直到某個時期以前沒有統一，形成了多頭聯絡、山頭林立的混亂局面。從這點講，對待各地的各種共產主義組織，都應該從共產國際與東亞共產主義運動這一觀點考察。補充一點說，一部分領導人後來走向「冒牌」共產黨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是1919年6月結成的全國學生運動的領導核心，也不外是五四學生運動——通常被認為是為中共的創立開辟了道路——的成果之一。由此可知，為早期中共提供了許多人才的四五學生運動和共產黨的創建之間的關係，也並不一定就是一條直線。

至於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精神矛盾和內心世界，則更加複雜。比如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青年向布爾什維克的轉變，上述李漢俊等激進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悲壯、孤獨的情懷，等等。本書中特以

施存統為例，對其思想和活動進行勾畫。施存統是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早期中共黨員之一，也是由無政府主義轉為布爾什維克的青年，中共「一大」召開時，他正在日本留學（因此日本警方才留下了他的資料）。他於1921年末因從事共產主義活動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是參與創建中共的黨員中最早被錄下口供的人。所以，尋覓他當時的事跡，不僅有助於了解加入共產黨的五四青年的思想歷程，而且對考察中共成立的具體過程也大有幫助。

由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由少數知識分子於1920年開始的創建中共的進程，在1921年7月的「一大」之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根據「一大」文件記載，當時黨員僅有53名。<sup>23</sup>在這個意義上講，本書要研究的是一個前後時間僅兩年左右、涉及人數不足百人的歷史現象。當然，後來的中共發生了很大變化，無論在質的方面，抑或在量的方面，都與創建時的中共截然不同。儘管如此，本書仍要對其進行研究，概略講來有三個原因。其一，歷史現象或大或小，並不影響從學術的角度探求其全貌的好奇心。其二，後來的中共從未改變過黨的名稱，也沒有發生大的分裂，在譜系上，早期的共產黨到底是其唯一的源頭。因此，中共的創立正是「星星之火」，儘管開始時是弱小的，但到底是擁有將近一億黨員的巨大執政黨的原點。

其三是基於對各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在20世紀世界史上的現代意義重要性的認識。所謂現代意義是指，由於國際間溝通和宣傳媒體的發展，類似的現象在世界各地互為因果、同時發生，而任何一個現象都不可能僅局限於一個國家之內，其影響也都超出一個國家的範圍。這一點，政治上表現在包括對民眾的影響大大增強，為了主義可以犧牲生命，為了主義可以殺人。意識形態時代由此拉開序幕。對於中國共產黨成立，一方面我們可以探討其與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思想的繼承性和隔

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中國一國歷史的巨大時間跨度，即通過比較後來中共面貌變化的方式來考察。我們這樣做時，就要思考前蘇聯的中共黨史學者反復提到過的一個問題，即從當時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觀之，中共是否是早產兒？當然，也可以採納部分歐美學者曾經使用過的方式，以中共成立與當時中國社會思想不相稱為由，認為中共的成立是蘇俄強行輸出革命的結果，而將其與後來毛澤東的中共（中國化的共產黨）相對比。但是，本書不準備按時間軸進行那樣的比較。因為，無論是不是早產兒，都改變不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一事實。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這一特定的時期裏，共產黨在許多國家相繼成立，中共的成立是這一歷史現象在中國的表現。要把中共成立史從後人評價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重新置於當時的環境中去，這就是本書的全部意圖。

在對本書做了簡略概括之後，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我們可以說那是「天時、地利、人和」相互結合的結果。也就是說，同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復蘇並傳向中國，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基礎（天時）；來自蘇俄的積極推動由於陸地相接而成為可能（地利）；五四運動後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集結（人和）。本書各章將分別對此三要素進行探討，儘管它們本身也是相互交錯的，並且「天地人」的表述也稍嫌陳腐。